

2

SHEHUI ZHILIXUE

社会治理学

殷昭举 主编

◎ 第二卷

◎ 社会和谐保健与社会问题化解

◎ 赫崇飞 罗红希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SHEHUI ZHILIXUE

社会治理学

殷昭举 主编

◎ 第二卷

◎ 社会和谐保健与社会问题化解

◎ 赫崇飞 罗红希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治理学. 第二卷. 社会和谐保健与社会问题化解/赫崇飞, 罗红希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361 - 5435 - 3

I. ①社… II. ①赫… ②罗… III. ①社会管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4750 号

第二卷 社会和谐保健与社会问题化解

DIERJUAN SHEHUI HEXIE BAOJIAN YU SHEHUI WENTI HUAJIE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电话: 020 - 87553735

<http://www.gdgjs.com.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 092 毫米 1/16 18 印张 247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社会治理学编委会

主 编：殷昭举

副主编：王 君 劳汉生 林艳芬 汪宇燕
曹康琳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君	王继辉	劳汉生	李 达
李 德	吴 涛	吴钢锋	肖凡平
汪宇燕	林艳芬	罗红希	赵 鹏
殷昭举	曹康琳	赫崇飞	熊永燕
樊向前			



总 序

实践者的“理论自觉”

郑杭生^①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针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的视野和世界的眼光，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伟大实践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

社会治理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这门学问，有一个路径选择

^① 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审组成员和召集人。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开始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学百多年发展的轨迹,根据中国社会学前辈艰辛探索学科本土化和努力把握学术话语权的启示,在我看来,研究社会治理重要且正确的路径同样是: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在社会治理领域,立足现实中的“现实”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近些年以来,即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在全国范围铺开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探索。这一创新实践和探索,为包括社会治理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概括和提炼现实,提供了来源和基础,也为我们创造了难得的学术机遇和挑战。我一贯主张,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地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包括社会治理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社会治理学》的作者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实践基础,把握好这样的辩证关系,沿着这样的正确路径,筚路蓝缕而终成正果。该书是著者积数十年社会治理工作实践之力、历时近八载编撰而成的心血之作。著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汲取古今中外社会治理思想精华;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探求中国社会治理基本规律;以各地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治理科学化具体路径。由实践到理论,由具体到抽象,创新了社会治理、社会自治、社会基础这三者共同构成的、完整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架构体系。书中形象地把社会看作一棵“社会树”:社会自治是“枝叶”,社会治理是“树干”,社会基础是“根基”,人民幸福安康则是盛开的“花朵”。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的基础上,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有机统一、和谐运行,最大



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增强社会凝聚力与亲和力。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①。在《社会治理学》中,有理论提炼、有实践探索,有历史钩沉、有现状剖析,有他山之石、有本土经验,有基本规律、有土法偏方,很值得社会领域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管理人员等借鉴。

一、《社会治理学》之成书离不开实践的勇气

作者几十年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一线摸爬滚打,遍历农村、社区、街道、区、市等各个层面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直接参与调研、制定社会建设和管理相关政策达300余件,常年在一線应对群体性事件、解决城镇化后遗症、化解突发公共危机、协调农村土地遗留问题、维护“外嫁女”合法权益、破解社会“二元结构”、处理劳资纠纷、疏导“隐形社会组织”、推动“虚拟社会”建设、组织村民(居民)换届选举……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没有旧例可循,没有既定法则,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执着与胆识。与此同时,作者还广泛地考察学习,对比借鉴日本、新加坡和欧美等国家以及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台湾、武汉、广州、深圳、杭州、惠州、珠海、佛山、郑州等地的做法和经验,然后从中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思想,再用以推动新的社会治理实践,并将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全力推动中山市和谐善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日之中山,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12年,全市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近120倍,工业总产值和国地两税收入均为1978年的1100多倍。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超24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山以仅占广东省1%的土地、3%的人口,连续多年创造了广东第五的经济总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今日之中山，民生福祉不断提升。惠民利民的制度安排逐步完善，近年来七成以上的财政收入投到民生领域。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万多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万多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4%和12.7%。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1，收入差距为全省最小。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领先发展，《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显示，中山幸福指数排名蝉联全省首位。今日之中山，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率先在全国创建农村社区“2+8+N”模式，获评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城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中山社会环境竞争力排名内地第一。《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显示，中山市城镇化质量名列全国286个城市的第6位，城镇化率名列第9位。连续5次获得全国社会治理综合治理优秀地市称号，连续3次荣获全国平安建设“长安杯”，是广东唯一连续3次荣获全国平安建设最高奖项“长安杯”的地级市。今日之中山，生态环境优美宜居。继全国最早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后，又成功创建为全国地级市中首个“国家生态市”。全市24个镇区全部成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在广东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中排名第一。国家监测报告显示，中山空气质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位列第六。今日之中山，文化名城魅力彰显。实施包括传承和发展孙中山文化在内的“八大文化工程”，在获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2012年又成功创建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26年举办“慈善万人行”活动，获得全国公益领域最高政府奖——“中华慈善奖”，被誉为“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一面旗帜”……毋庸置疑，没有这些实践基础就不可能有这样一部书。《社会治理学》之难能可贵，就在于其理论创新之花深深地根植于长期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二、《社会治理学》之成书离不开理论的自觉

“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



“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10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费老这样说明“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我感到‘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空想。有志于研究社会 and 文化的学者对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在费老《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只有从历史造成的西方强势文化和强势社会学理论中解放出来，以我为主，学会对它们的借鉴，即学习它们的精华之处尤其是精华之处中的适合中国国情之处，而不是对它们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如果没有自主性，只有边陲性，没有自己可美的东西，只有别人可美的东西，那就做不到“各美其美”，那就只剩下单纯的“美人之美”，为他人做嫁衣裳了。着眼于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课题、挑战 and 选择。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正确的答案显然是前者。这就是说，包括社会治理学在内的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对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并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

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把中国社会学定位为世界眼光和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之所以是首要的“理论自觉”，是因为：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能不影响到如何办社会学系、如何办社会学研究所、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社会学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等等。按照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社会学的目标，那么结果是积极的；而追求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的目标，那么结果就会是消极的。中国和平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相应地，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也是势所必然。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学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减缩依附性的客观要求，是逐步消除那种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的前沿的边陲思维的有效良方。不同中国学派之间当然也会有学术问题上的分歧、争论，这是正常的。真正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他们之间正常的学术争鸣的开展，将大大缩小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的空间。实现“理论自觉”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个方法主要包括如下的两个方面——这也正是《社会治理学》这部书所努力体现的。其一，对“二维效应”做出自己的理论反思。其二，用“二维视野”做出自己的理论升华。下面就对这两方面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三、《社会治理学》对“二维效应”做出自己的理论反思

我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维度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维度。我曾经提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



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二维效应”既包含正向效应又包含负向效应。负向效应主要体现为“两类挑战”：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像 SARS、甲型 H1N1 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文明认同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引起的生态危机，等等。2008 年年底去世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 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世界性的文明认同危机及其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我们又一次见证了这种人为造成的“人类困境”给人类自身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

今后，全球社会的各种差别、分异、矛盾和冲突，比如经济市场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和非理性、社会风险化、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生态环境危机、贫困现象、弱势群体、社会公正、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社会成员对幸福及人生价值的新期待等不断生产出新的裂痕，造成新的问题，还会出现人们如今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

本土性的“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连的特殊挑战：一是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二是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三是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四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五是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六是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所有这些挑战，归根到底都与社会资源（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是否合理配置和分配有关。

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都这样那样与上述六大挑战有关，或者说是某一或某几种挑战的表现，并显露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社会矛盾及不协调因素的焦点。随着我国社会分化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特别是新生利益群体构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主体，其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成因，也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二是基层的利益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点。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中，相当数量是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矛盾中。这类矛盾直接与群众的基本利益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且涉及的人员众多，影响范围较大，往往后果严重，有很大的危险性。三是不同领域的矛盾形成链式反应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倾向。由于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其中许多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辐射性，形成了跨行业、跨地区、跨体制的网络，在社会关系上相互牵扯。这种状况使得局部矛盾容易传导到更大的社会领域。四是地方政府首当其冲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突出特点。现在的党群、干群关系普遍比较紧张，各地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多，特别是地方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一些矛盾现象与地方政府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矛盾本身就是地方政府造成的，这样就把政府推到了矛盾的第一线。五是制度性缺陷使社会矛盾形成恶性循环。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上有浓厚的“官控”“官治”“官办”传统，习惯于通过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重复性介入和干预来处理实际中的同类问题，这种人治或半人治的管理方式不仅消耗了大量的体制资源，而且治理效果不佳，常常会激化、加剧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基层社会问题不断复发、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之一。六是特权阶层对体制的俘获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官控”“官治”“官办”传统具有一种机制，即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构成很高的互换率，使得体制在客观上容易被侵蚀。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不断地冲击政策和规则



的底线，导致系统性和根源性的社会不公平，对更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造成体制性排斥，等等。每一道裂痕都意味着和谐与冲突的复杂胶着，每一个问题都表现了利益与矛盾的具体聚焦。这是一个充满非常风险、重新开拓前景的时代，我们称之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也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境界，同时也在最新的实践中扩展着和更新着自己的理念。正是由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依循，对这一实践过程的维护建设性阐述和理论性总结反而需要超常的勇气，需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调查、研究、概括、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甚至有原创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才能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社会治理学》的理论创新之根，深深地扎进了肥沃的社会实践之壤。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并就其所呈现出的“利益矛盾普遍化、矛盾主体多元化、一般问题复杂化、个体问题群体化、群体问题组织化、组织发动网络化、诉求表达对抗化、内部矛盾外部化”的特点，反思了过去在应对、化解社会矛盾所存在的“失之过宽”与“失之过严”的普遍问题。所谓“失之过宽”，是指面对社会矛盾纠纷，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不惜“以妥协求和谐”，过度依赖于“花钱买平安”，化解社会矛盾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客观上“激励”了更多的人采用法律以外的方式甚至用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导致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局面，人为助长社会矛盾愈加激烈。所谓“失之过严”，就是把社会成员维护合法权益的行为，上纲上线，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对抗，完全依赖于动用武装力量来解决问题，造成仇警、仇官的社会心态越来越严重，产生“抗生素效应”。

作者对此建设性地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科学化的五个关键环节。一是社

会治理保健化。这是从源头上抓好社会治理的根本要求。只有切实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发展好,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预防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的产生。因此,维稳的基础是维权,保健的基础是保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百姓基本生活,是社会治理的“本”和“源”。二是社会治理法治化。要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公共危机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公共危机的长效、制度化手段。三是社会治理系统化。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灭火队式”治理模式,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看待,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四是社会治理社会化。要致力于在服务中实施治理,在治理中体现服务,寓治理于服务之中,以服务促治理,在治理中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由防范性管理向平等型、服务型治理转变;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自助、自理能力;保障民权、发展民主、促进民生、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建设“和谐社会”与“活力社会”。五是社会治理信息化。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信息化手段加强创新社会治理,积极提高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形成全面覆盖、联通共享、动态跟踪、功能齐全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提高社会治理系统效能。首先,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网络虚拟社会治理,坚持建设与规范并重、发展与管理同步,推进法律规范、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信息网络治理体系建设。其次,要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坚持以信息化为牵引,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按照上下对接、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整合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公共服务机构、行业组织的相关信息,完善公共基础信息资源库建设。加强对各类社会治理要素的动态监管,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动态化水平。



四、《社会学》对“二维视野”做出自己的理论升华

对“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侧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我们以前还提过：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现在我们提出的“二维视野”“二维视角”，正是一以贯之主张的延伸和发挥。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研究、概括和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精神。

我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的“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在这里，无论是“顶天”还是“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就是把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使之具体化和通俗化。“顶天立地”的精神要求

我们要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尤其要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中国经验”是“本土性”的主要内容，我们非常赞同要研究“中国经验”。因为研究“中国经验”本来就是中国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优良传统。哪有自称为中国社会学家的人，不这样那样地研究“中国经验”？不研究“中国经验”，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中国社会学家？这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什么是“中国经验”外，还有如何看待“中国经验”，用什么视野来研究“中国经验”。我们一贯主张“通过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的多形式结合，以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社会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治理学的发展是理论构建与经验研究的一体化过程。理论构建的途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自觉地继承和发掘各种优秀的学术传统、运用各种有价值的学术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经验研究方面，则既要关注现代性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要投身于本土社会转型变迁的经验研究，这能够为理论构建提供持久的现实资源，使之上升为更新的理论形态——这一路径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传统。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社会治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必须服从这一路径，而且社会治理学要更加凸显这样的双向发展过程：在关注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通过经验研究来推进理论的构建，并将所获得的理论成果重新引入到经验观察和分析之中，再通过这种在实践中展开的研究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可以说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



“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比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在“自下而上”的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发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

《社会治理学》的作者正是以这些“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努力探索社会治理基本规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进行狭隘的单极化和封闭性思维，而是拓宽国际视野，着眼于社会学的宏大背景，首先梳理出社会治理学的理论路径，然后再进行社会治理规律的总结和研究。此路径从“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研究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的双重属性主导着人的社会化和化社会的辩证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出现社会问题甚至问题社会；面对社会问题和问题社会，人